中国当代文学50年

主　编　王万森　吴义勤　房福贤

副主编　石兴泽　张　欣　胡俊海

参编者　于　波　王万森　田广文

石兴泽　丛坤赤　朱　敏

刘永春　刘新锁　许廷顺

张　欣　吴义勤　李建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1）
一　现代化的方向和多元文化的融会……（1）
二　中国当代文学50年的基本轮廓……（7）
三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16）
第二章　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及其变异……（20）
一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20）
二　“文艺思想斗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31）
三　“文革”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厄运……（41）
四　台湾现代派文学与乡土文学的论争……（48）
第三章　解放区文学传统的新发展……（58）
一　赵树理的小说……（58）
二　孙犁的小说……（65）
第四章　革命历史斗争小说……（73）
一　《红旗谱》与《红岩》……（73）
二　《青春之歌》与《三家巷》……（81）
三　《保卫延安》、《红日》与《林海雪原》……（88）
四　王愿坚与峻青的小说……（97）
第五章　农村现实生活的写照……（103）
一　柳青与周立波的小说……（103）

二　李准与马烽的小说……（110）
第六章　小说创作的多样化探索……（117）
一　路翎与茹志鹃的小说……（117）
二　“百花小说”……（122）
第七章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诗歌……（127）
一　诗与诗人……（127）
二　闻捷与李季的诗歌……（135）
三　郭小川与贺敬之的诗歌……（141）
第八章　风格各异的时代颂歌……（148）
一　杨朔的散文……（152）
二　秦牧的散文……（157）
三　刘白羽的散文……（162）
第九章　“十七年”戏剧文学……（167）
一　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167）
二　田汉等作家的历史剧……（181）
三　老舍的话剧……（188）
第十章　前期港台文学……（198）
一　现代与乡土共存的台湾文学……（1 98）
二　在徘徊中走向自立的香港文学……（212）
第十一章　转型期的文学变革……（219）
一　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文学“本体”
确立的艰难……（220）
二　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
形态的开放性……（226）
三　从中心到边缘：文学回到了其本源的位置……（229）
四　从封闭到开放：华文文学的交流与融合……（230）

第十二章　写实小说……（233）
一　“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233）
二　“寻根小说”及民俗风情小说……（242）
三　“改革小说”及军旅小说……（250）
四　“新写实小说”及“新现实主义小说”……（258）
五　历史小说……（266）
第十三章　新潮小说……（274）
一　“中国式现代派小说”……（274）
二　“先锋派小说”……（282）
三　新历史主义小说……（289）
第十四章　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及网络小说……（299）
一　女性小说……（299）
二　新生代小说……（307）
三　网络小说……（315）
第十五章　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复归与深化……（322）
一　艾青与“归来者”诗人……（322）
二　年轻的现实主义诗人……（333）
第十六章　新诗潮的出现和演变……（338）
一　《今天》与朦胧诗……（338）
二　“新生代”诗人及其他……（344）
第十七章　散文的多样化探索……（354）
一　理性反思散文……（354）
二　乡土风情散文……（362）
三　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370）
四　新散文……（379）
五　报告文学……（388）

第十八章　新时期话剧文学……（396）
一　写实剧……（396）
二　新潮话剧……（409）
第十九章　后期港台文学……（416）
一　近20年台湾文学潮流……（41 6）
二　香港文学的多元化格局……（425）
参考文献……（434）
后　　记……（4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次文代会①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阶段性划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其成就是以往任何阶段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历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代文学的流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行进中由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推动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在存在形态上，至今也未能完整如一，血脉相连的两岸文学还只能在隔海相望中期盼着统一。

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应当能够对当代文学50年看得更加充分些。

一现代化的方向和多元文化的融会

当代文学是20世纪文学的后半部分。对于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整体取向而言，当代文学对近代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

① 指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呼应，对现代文学也不是自然化的延伸和发展，而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上已然初具规模，在文学的内涵上已开始显示现代化的特点，无论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还是社会审美心理结构，都呈现步入现代化的一些文化特征。

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形态及其文化构成对文学的审美性质和时代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主人翁地位日益巩固；尤其是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强大思想动力，社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量的增长，更体现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逐步深入，社会结构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现代性的因素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构成中获得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当代文学的社会审美已经被置于现代化发展的簇新的时代基础之上。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文化构成和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社会心理结构制约和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新中国50年文学，既体现着我们这个民族从“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方向，又有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具形态和内在特征；就其文学运动本体而言，则经历了从革命现实主义一家独尊到走向多元构成的推进式发展过程。而且还须看到，即使是在极端强调革命现实主义的日子里，文学的文化构成也并非绝对单一，而是有着多种文化的历史积累和渗透融通。至于“文革”之后摆脱了极“左”思潮羁绊的文学，就更是敞开胸怀拥抱中外古今优秀文化的多元因素。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中国新文学建设中

应当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今天更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成必然趋势，文化的全球化必将成为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方面，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将成为必要的和可能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有垄断图谋的大国觊觎文化霸权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强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意识，就不只是本民族自身新文化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参与文化全球化的对话和建构的需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丽辉煌的一个文化系统，如今，在人类历史步入21世纪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中华民族文化将会更加璀璨夺目而且不可替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同样是非常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同一般而言的新与旧、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样，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任何文学的创新都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积累。在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中，无不浸润着民族精神的精华，无不积淀着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另外，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还因为有着历史的教训所带来的启示。近代以来，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曾屡遭冲击，长期的战乱，革命中的“左”的思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横扫一切”的文化浩劫，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而中国当代文学无论自身发展还是与世界文学对话，都特别需要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实根基。这样，在当代文学内部就存在着结构性的尖锐矛盾。当然，这一矛盾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它是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早已对此问题进行过精辟论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也足以显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所取得的成果。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认真汲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才能推进文学发展。无论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还是对每一作家个体都是如此。我们的优秀的当代文学必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必定是具有民族风格的。

继承和发扬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是当代文学发展中意义特别突出的问题。革命文化传统既包括“五四”文化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又包括党和人民长期以来在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果。曾有颇具识见的学者用“启蒙”和“救亡”来概括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的历程，辨析两个思想文化形态及其各自的侧重点。这种认识对于理解我国的现代文化运动极有启发意义。作为历史的回顾，我们确实应当重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注意其历史规定性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必要运用辩证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上，尽管两种思想文化形态之间存在差异，甚或出现历史的交叉形态，但同时在总体上又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在人的解放这个主题上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以批判宗法自然经济社会作为出发点，经历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直至踏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

在反帝反封建、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伟大事业中，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转化为我们民族特有的革命文化积淀，凝聚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支柱。在当代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历史联系中，革命文化传统是作为精神中枢贯穿其中的。“五四”文学的旗帜，民族化、大众化的革命文学的旗帜指引着当代文学前进的道路。当我们审视当代文学时不难发现，当代文学中各种文学思潮的发展和各种文体创作的轨迹都是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这是文学在历史运动中的开拓和深化，即发扬革命文化精神，在参与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着文学自身的变革。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是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我们曾经把“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代的文艺总方针，它适应了新民主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革命对于文艺的历史要求，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总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指导思想的科学概括。它昭示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文艺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所应体现的历史方向与时代使命。这又是历史反思的思想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偏离革命文化传统，片面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践踏了文艺客观规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明确地把尊重文艺规律融入革命文化传统的科学内涵之中。

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经验，又是全球化语境中面对的新课题。全球化语境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进行超越空间的对话、沟通、交流和互动，是经济发达和高科技成果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时代文化特征。任何民族、任何地区的文化都不可能在与文化全球化相隔绝的状态中求得发展。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刚刚发现，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早已开始了。回顾当代文学的历程，会感受到文化的全球化对其发展十分有利。当代文学不仅需要本民族文化的滋养，也需要借鉴世界上所有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尤其需要先进文化的新成果和新信息。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和交流，要求我们的文化有自己民族的立足点，具有民族文化主体的强大实力，特别要发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凝聚成的时代精神这一独特优势。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当代文学应当担负起弘扬民族精神，重铸民族灵魂的民族责任和时代使命。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的，在指导思想上曾经出现过偏差，其主要表现是“左”的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文革”，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的影响，盲目排外，实行封闭政策。在文学领域，把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形成之后的文学现象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货色。这

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文学的贫血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文学观念、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因此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其次，盲目性的教训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一旦打开国门，国外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文本大量涌入，曾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现象，结果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食洋不化 ”。

在借鉴世界文学的成功经验、汲取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方面，新时代文学开拓了崭新的局面。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为其提供了政治的保证，而且为其开辟了无比广阔的文化空间。新时代文学在每一阶段的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都曾遇到过的，尽管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有着诸多不同，但其基本的经验往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几乎每一个文学思潮的发生，每一种艺术手法的推出，都不难发现世界文学的影响。这种借鉴的成功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不乏其例。比如“ 寻根文学 ”的涌现，除去民族文化的内在根据之外，一个很直接的动因就是拉美文学奇迹所带来的影响。当然，借鉴世界文学的经验决不意味着简单地移植。世界文学的种子一经落入中国文学的土壤，就要能够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也就是说，“ 拿来 ”之后再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例如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一旦在新时期文学中落户，就已然融化为“ 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了。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在当代发展阶段上的文学，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在初级阶段这个社会基础上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五四 ”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以及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从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构成；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认识和探索文学的艺术规律，并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更新文学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文

学的多样化形态和多元化趋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学充满生机。

台湾地区的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由“一国两制”而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合理构架。两岸文学间的互为参照，双向互动，不仅具有历史的可能性，而且早已成为文学史的事实。这当然不是政策的演绎，而是两岸文学的对话和融通的确认。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最终不会因人为的因素而被割裂。无论香港文学、澳门文学还是台湾文学，始终都归属于一部中国文学史。今天，我们将关切的目光投注到台湾文学，并理所当然地将其融入这部当代文学史。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岸的学界同行必能联手写出一部更完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无论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富内涵，还是包括台湾文学、港澳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的多元融会，都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广阔的文化空间。

二　中国当代文学50年的基本轮廓

自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史的课程出现以来，历经从事此项教学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多年努力，已经大体上确立了相对独立的文化视野和学术规范。比如在时空关系上，将社会主义文学划分为从第一次文代会拉开序幕至“文革”结束与新时期这样两个大段落；确认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必须包括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不然，就只能称“半部当代文学史”。

对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起决定作用的，说到底并非任何人为的

因素（尽管人为因素有着一定的作用），而是文学发展内部所存在的文化机制。海峡两岸的文学同根同源，这已是所有尊重历史文化的学者的共识；50年来她们在各自空间的发展都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它们存在的形态有明显差异，但都未曾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更无法抹去“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影响。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通常将其分别表述，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将其分割开来。恰恰相反，在话分两头的文学史的事实中间，不难发现在民族文化上内在联系的同构性。

不少学者将新中国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延安时期，这是极有见地的。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经典文献，在提出并着手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这样的核心问题的时候，为革命文学确定了服务方向、指导方针、文化体制和价值规范。这一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经典性的理论体系，在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从而成为建国之后文学发展的指导性的理论。

建国后27年的文学时起时伏，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学理论在此期间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局限性。

其积极作用在于适应了文学表现建国后现实生活的需要。广大工农兵在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焕发出高度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描写他们新的生活，歌颂其豪迈的英雄精神是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适应着这种要求，延安时期的文学经验和理论得以深入贯彻和大力推广。工农兵是新生活的主人翁，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对工农兵如此热情地关注，对其革命精神如此集中地颂扬，这是其他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无可比拟的。延安文学的种子在新中国遍地开花结果。特别是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生动表现。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柳

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浩然的《艳阳天》等，都是反映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其积极作用还在于适应了文学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的需要。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创造了辉煌业绩。延安时期的文学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只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来不及充分加以描写。建国后，作家们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有机会发扬延安文学的传统，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历史生活熔铸到创作之中。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有鲜明的英雄形象，突出的斗争主题，而且颇具艺术感染力。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冯德英的《苦菜花》以及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是有代表性的作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等集中写革命战争的小说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其积极作用还表现于对作家队伍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正确地认识生活与创作的源流关系，推动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要求。尤其是抗美援朝以及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都吸引了大批作家。巴金、魏巍、路翎、杨朔、陆柱国等作家奔赴朝鲜前线，创作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谁是最可爱的人》、《洼地上的“战役”》、《三千里江山》、《上甘岭》等优秀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则是这几位作家长期扎根农村的收获。其二，鼓励作家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进行艺术探索。赵树理早在建国前就追求让农民喜闻乐见的小说写法，建国后在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方面创造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新鲜经验。老舍创作了《龙须沟》、《茶馆》等京味话剧。郭小川和贺敬之等诗人在将古典的、民族的和外国的诗歌的写法融入新诗的诗体形式的实验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杨朔与秦牧、吴伯箫、刘白羽等各自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称誉文坛。田汉在历史剧《关汉卿》的创作中所进行的诗剧的尝试，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50年代后期“左”的思潮抬头，60年代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潮导致后来“文革”悲剧的发生。这样的历史教训在文学领域也严重存在。首先，在理论上搞乱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学建设中要讲政治，文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但是，文学和政治同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尽管政治总是处于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不应忽视文学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及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却未能坚持科学的、清醒的认识，一度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片面性口号，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利用来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纲领，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造成的混乱，使党的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受到影响，导致了政策的严重失误。其次，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的、教育的、认识的和愉悦的多种功能，在通常情况下，审美的功能是其首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功能，其他的功能往往通过它才得以实现。但是建国以来由于受苏联文学中形而上学理论的影响，我们在文学功能的问题上产生过糊涂认识。比如，在学习和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过程中，在贯彻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的同时，也产生了狭隘功利主义的倾向。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曾以偏概全地将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的概括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归结为“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周扬在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就曾经直截了当地为狭隘功利主义做了注脚：“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去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应该成为我们的电影创作以及一切文艺创

作最根本的最中心的任务。”①时隔十几年，“四人帮”在“文革”中提出了“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等一套形而上学的谬论。无法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文学的特性和内在规律，成为产生公式化和概念化弊端的主要根源。另外，还严重束缚了广大作家的艺术创造精神。虽然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其后的第二次文代会、贯彻“双百方针”、60年代初的文艺政策调整等重要的历史时刻，都再三重申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政策。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影响，政策的执行常常受到冲击。例如，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对作家队伍的打击面不断扩大，造成的伤害越来越严重。再如政策的狭隘功利主义要求作家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并且到工人农民中去接受改造，严重挫伤了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理论的混乱和政策的失误，也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僵化和艺术思维的封闭，压抑了在精神上独立创造、在艺术上自由探索的创新意识。

十年“文革”灾难深重，却也为历史反思提供了契机。在文学领域，“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是造成“文革”悲剧的直接原因，但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也就是说，这场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存在着社会历史的深刻背景。长期以来，文学的理论体系和文学的观念越来越深地陷入形而上学，既脱离现实社会的心理基础，又偏离历史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文艺政策的调整曾在很大程度上有所补救，但仍然未能扼制“左”的思潮的恶性发作。与此同时，灾难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在历史反思中，文学的大变革成为必然。1976年春天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曙光。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文学观念到创作实践发生大转变的20

①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年。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看做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发生全面变革的阶段。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发表是新时期文学发端的标志，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大检阅。其后的80年代文学，有人用“两个回归”来表述其变革，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首先，是“文学的回归”。在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的全社会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界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其实，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急于找到答案，而在于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正是文学观念变革的过程。观念的变革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层面。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为这场讨论做出科学总结的是邓小平。他在1980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①在他的主持下，决定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方针，而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其二，文学功能的层面。一方面，明确了文学具备多项功能，各种功能之间有着互为依存而且互动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由文学的特性所决定，审美功能在文学这个系统中占有中心的和首要的位置，否定那种片面强调教育功能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还文学以本来面目。其三，创作方法的层面。作为对“文革”期间暴露的

① 《日前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